清史纂修

简析邓凯和《也是录》

吕振宇

顺治元年（1644），崇祯朝被李自成大顺军推翻后，尚控制着中国南方的明朝旧臣打着复明继而抗清的旗帜，先后拥立了五个明室后裔建立政权，历史进入了所谓“南明”时期。在清军的打击和彼此的争斗下，弘光、隆武、鲁王监国、绍武政权昙花一现地相继败亡了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，建号永历。迫于形势，永历政权先后与李自成大顺军、张献忠大西军残部合作，取得了南明时期仅有的两次抗清斗争的高潮。但政权内部始终矛盾重重，文臣党同伐异，武将构衅称戈，极大地分散和损耗了有生力量。作为傀儡，永历皇帝也辗转流离于湖广、云贵之间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清廷趁孙可望、李定国交讧两伤的机会，分兵三路进逼西南。顺治十六年，永历皇帝溃逃入缅，被缅王恕置于实皆。之后三年，南明军队在李定国、白文选等率领下四次入缅迎驾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吴三桂进军缅甸，俘杀朱由榔，永历政权覆灭。

在南明史上，永历政权历时最久，影响最大，可评述的史事很多，值得深入研究。谈到研究基础，现存的永历前期和中期的史料比较丰富。而后期，尤其是永历君臣流亡缅甸的三年，相关历史记录则少得可怜。在这三四种史料中，以邓凯所撰《也是录》[①]一书最有价值。对于其人其书，前贤已有一定的论说、考评与笺证[②]。本文拟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，对邓凯、《也是录》及相关一些问题欲做更为详细的考释，并提出新的分析与述评。

一

邓凯，字不详，为僧后取名自非，号普然，又号邓和尚、也是和尚，江西吉安人。

邓凯生卒年不详。据《也是录》，辛丑末（1662 年 1 月）邓凯即自称“老臣”，年岁当已不小。郑达在《野史无文》中说：“岁在庚午冬杪，予游衡岳，于碧云崖精舍逢一老僧，号自非，江右人，姓邓名凯。”[③]保守地估计，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邓凯在六十岁以上，据此他应该生于崇祯三年（1630）以前。金钟在《皇明末造录》中说：“有江右僧昔在扈从，以被俘剃度，至金陵。”这篇叙述当在“乙亥春三月”[④]，那么，邓凯在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以前曾到过南京。这也是目前所知邓凯最晚的活动了。

关于邓凯前半生的事迹，详见《也是录》、邵廷采《西南纪事》、陈鼎《留溪外传》三书。《西南纪事》卷七《邓凯传》几乎全袭《也是录》，甚至包括“论”的部分；《留溪外传》卷十八《也是和尚传》文字稍有增益，应是陈鼎加入了自己一些在滇的见闻。另外，戴笠《行在阳秋》[⑤]、叶梦珠《续编绥寇纪略》、成海应《皇明遗民传》[⑥]、光绪《吉安府志》卷三十四《忠节》、秦光玉《明季滇南遗民录》、钱海岳《南明史》等书也为邓凯立了传，但大都引述前三书的内容，没有多少参

［收稿日期］2012－12－10
［作者简介］吕振宇（1981—），男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；上海 200241

考价值。倒是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十一《流寓》和康熙《昆阳州志》卷九《流寓》对邓凯后半生的行踪作了一些交代。

大略而言：顺治三年（1646）春，邓凯跟从大学士杨廷麟等人在赣州起兵反清，隆武皇帝遥授总兵。至十月，赣州失守，督师万元吉、吏部主事龚棻托孤邓凯。次年冬，邓凯获知其父被害，重新起兵复仇。失败后，清廷绘形缉拿，邓凯逃匿吴楚之间。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十月，邓凯闻听永历皇帝跸滇，驰赴觐见，但被孙可望军阻于武冈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三月，邓凯始至昆明。八月，加都督同知，命守大明门。十二月，清军入滇，邓凯扈从永历皇帝经大理、腾越逃往缅甸，驻于实皆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七月，缅王以饮咒水盟誓相召，将文武大臣四十二人围而杀之，邓凯伤足不能赴行，获免。十一月，清军入缅，俘永历皇帝及邓凯等人。次年四月，永历皇帝被绞杀于昆明。吴三桂使隶镶黄旗，邓凯不受，剃发明志，被安置于昆阳州普照寺。五月，邓凯以在缅三年的亲身经历撰述了《也是录》。

康熙元年（1662）五月以后，邓凯的事迹变得模糊起来，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星记载勾勒出一个大概情况。

在普照寺，邓凯与昆阳迟光启交契。迟氏遗集有邓凯序[⑦]，因较为罕见，兹全录如下：

> 自余之不死，而长为行粥饭僧于昆阳普照寺也。扃居牖下，羞与人见，亦无可见者。一日，有老人来游，童子携酒果以从，余自窗隙中窥之，毡巾布袍，貌古。余私念曰：“异哉老人也。”须臾，登毗卢阁，列酒果而饮，歌声出金石。余潜至阁下听之，则六言绝句也。其词曰：“把酒纵谈往事，眼前依旧青山。云中帝子何在？几次招魂未还。”歌罢大哭，余亦不觉潸潸泪下。登阁与揖，问姓字，始知为藿场老人也。老人姓迟氏，初为昆明世胄。光启字开先，以其父明经白化公避家难，赘于昆阳徐氏，今冒姓徐。藿场其自号也。老人亦叩余行脚，余呜咽不能对，相别而去。余问寺僧，少即以孝称乡党，盖博学而厌乱以隐者也，心愈重之。他日，老人复来。余度不能隐，乃举缅中事告之，至陵夷惨伤处，未尝不憾于权奸之误国，相对而泣。老人亦时以其诗歌见示，大都皆凄楚之音耳。余与老人，遂成莫逆。秋七月，余将有还乡之举，与老人别于寺中，因出《跸缅录》为老人赠，而告之曰：“此余之所以不死也。”并叙与老人相识之缘起于其诗，以为余异日再至昆阳普照寺之公案云。壬寅初秋，吴西邓凯识。

迟光启工诗，康熙《云南府志》载邓凯“以诗自娱，时或狂啸、恸哭”，大概就是与迟氏互相唱和吧。

另外，序中所言康熙元年“秋七月，余将有还乡之举”，实际上并未成行。康熙《昆阳州志》说：“（邓凯）入滇寓昆阳旸光寺，暮年归里。”康熙《云南府志》也说：“州守童复晊为（邓凯）结庵于阳光寺……居数年，奉旨令还籍。”据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十一《官师》记载，童复晊于顺治十六年担任昆阳知州，而下一任徐士彦理政在康熙二年，因此邓凯到旸光寺的时间只可能在康熙一、二年间。可以看出，由于当时环境和邓凯身份的特殊，回赣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批准。他仍被安置于昆阳，并且从城外的普照寺移到了城内的旸光寺[⑧]，以加强管理。

那么，邓凯又是什么时候返乡的呢？康熙四年（1665）冬，“（康熙皇帝）谕礼部：本朝定鼎以来，故明朱氏宗族归顺，有官品者，给与房地奴仆、俸禄恩养；无官品者，俱照民人归农，令其得所。其故明各帝陵墓，世祖章皇帝有旨设人看守，以时祭祀不绝。此皆昭示恩养宽仁之意。近有朱氏无知之徒，改易姓名，隐藏逃避，致生事端，被人讦告。既累本身，又负国家恩养。尔部行文直隶各省督抚刊示晓谕：如朱氏宗族改易姓名、隐藏逃避者，俱令回籍，各安生理。勿仍前疑惧，有负朕浩荡之恩。”[⑨]与之相呼应，清廷此后不久就出台了安置前朝遗民的政策。事实上，傅增湘先生曾在苏杭见过《也是录》的一个旧抄本，“前有康熙六年周肇孔遯庵跋，言遇自非于昆明云云。”[⑩]可见，康熙五、六年间邓凯已经恢复自由，可以在昆明与人交流并且为己书索序了。

应该就在这一段或者稍前的时间里，邓凯“闻永王死骨弃于郊，乃椎心泣血，提筐拾之。墟中滇父老子弟相向悲泣，军中皆感动，各赠金钱无算，遂葬”[11]。之后，邓凯大概就“奉旨”离滇回赣了。《存信编》所谓“后还豫章”[12]应该只是沈佳约略的猜测，邓凯最可能的去向还是故里吉安。

如前所述，邓凯曾经在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游历衡山，南京之行大约也在左近。笔者认为，邓凯游历这些地方，除了一般遗民所具有的“生存常态”、“凭吊仪式”、“联络声气”、“稽察形胜”[13]等动机外，还背负着广泛传播《也是录》的重要责任。正是由于这种“居缅三载颠末，凯若不述，后贤何由知之”[14]、“余之所以不死”的使命感以及相关努力，使得《也是录》一书，或者说《也是录》一书的内容能保存至今。

因为邓凯耿耿忠义，又苦心存史，后人多有赞誉。这里略引几首表彰邓氏的诗歌如下：

> 可怜崎岖爝火投南徼，诸公中泥中露歌式微。折足生还邓都督，曾记包胥九顿仪。弃余流落归好事，足补故官文献资。[15]

> 岂隶镶黄旗，依然拥朱轮。我知邓凯忠，不忘故君恩。普照寺前月，昆阳岭头云。为僧不为官，清浊从此分。[16]

关于邓凯的著作，以温睿临《南疆逸史·凡例》所举为最详：温氏列邓凯《滇缅纪闻》、《滇缅日记》于“专纪永历事”类，列邓凯《遗忠录》、《求野录》、《也是录》于“专纪一人一事”类。《明季纪事目录》因之。

全祖望在《明洪熙古剌水歌为马嶰谷作》序中说：“《滇缅录》云晋王李定国尝乞师于古剌。”可以肯定，全氏所见的这个《滇缅录》是邓凯所作，至少题为邓凯所作[17]，或者就是《滇缅纪闻》、《滇缅日记》的一种。李定国乞师古剌，《也是录》没有提及，仅见于魏源《圣武记》卷六《乾隆征缅记》，其云：“明永历入缅时，其遗臣散入各国，李定国遣马九功约古剌，遣江国泰约暹罗，议犄角攻缅，裂其地，二国各遣使报诺。”这种说法其实来自胡钦华《天南纪事》，而《圣武记》经过传抄已经错讹得很严重了[18]。或者，《滇缅录》、《滇缅纪闻》、《滇缅日记》即《天南纪事》。它们的性质，应该都是以《也是录》为基础、加入其他材料增删损益而成的二次文献。

《求野录》的问题更复杂一些。现存的《求野录》，诸家多疑并非邓凯所作，所谓“《也是录》为亲身经历，记所见闻之作，而《求野录》为编纂之作。既知《也是录》为邓凯撰，则《求野录》不应出自邓凯手”[19]；而且，其书内容也与“专纪一人一事”的记述不符。因此，温睿临《南疆逸史·凡例》所列《求野录》可能另有他书。朱希祖先生《再跋求野录》指出现存的《求野录》就是经人改易的胡钦华《天南纪事》卷下《永历帝入缅本末》三篇，究其原因，“作伪者隐托之于邓凯”。笔者完全同意这种观点。在这里，为朱先生提供两条重要佐证：其一，国家图书馆藏《三异词录十二种》收有“客溪樵隐”《求野录》，其目次与《天南纪事》同为“永历帝入缅本末之上、中、下”。据夏定域先生考证，“客溪樵隐”即胡钦华[20]。显然，国图本《求野录》属于较原始的形态，还保留着其书脱胎《天南纪事》的痕迹。其二，以上文所引古剌、暹罗约兵一段材料来看，《天南纪事》略详于国图本《求野录》，而通行本《求野录》则存在明显的脱字和误字[21]。这个不可逆的现象再次证明《求野录》源自《天南纪事》。至于温睿临引用的“邓凯之《求野录》”，朱先生认为“益令人有求之不得之叹”[22]。不过，一方面，无论是“遗忠”还是“求野”的称呼，都不像是邓凯本人冠取的书名；另一方面，查阅《南疆逸史》中相关历史的叙述，并没有超出《也是录》记载的内容。据此，笔者认为，在温氏不误的前提下，他所见题为邓凯撰著的《遗忠录》、《求野录》应该与《也是录》的内容差异不大，或者就是他人为《也是录》取的异名。事实上，《也是录》成书后即为诸人口耳传授，复经各家改易流布，致使名称混乱，版本繁多，如其书诞生之初称《跸缅录》，周肇孔作跋时称《也是录》，传至江南又被叫作《滇南始末》[23]。而在这个传抄过程中，各版本之间更产生了不少文字增减、故事出入的现象[24]。

另有《生还纪事》一书，入《禁书总目》。杨凤苞《南疆逸史跋》列于“专纪一人一事及合纪殉难事”类，旁注：“或云邓凯撰，非。”[25]杨氏所说可取。苏瀜《惕斋见闻录》称：“闯贼破燕京，凡载诸臣死节、刑辱、投逆、授伪职事，如《北京日纪》、《生还纪事》、《燕邸日钞》……言之详矣。”[26]可见，《生还纪事》是一部描述甲申之际北京时事的著作，名似《也是录》，其实并非邓凯所作。

二

《也是录》以日记体叙事，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永历君臣从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（1659 年 1 月 7 日）逃离昆明，到康熙元年三月十三日（1662 年 4 月 30 日）回到昆明这一段时间的大小事迹，兼述邓凯自己的一些情况。在该书最后，邓凯写明“于玄黓摄提格天中节后六日，寓昆阳州普照寺纪录”，即作于康熙元年五月十一日（1662 年 6 月 26 日）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永历君臣入缅三年的亲历者追述的第一手材料，价值异常珍贵。在相关几种重要史料中，刘茝《狩缅纪事》最有价值的记录是他自己在滇缅边界的经历；顾开雍《客滇杂钞》为转述他人之见闻，且偏重于李定国、白文选与缅作战的事迹；杨德泽《杨监笔记》由于太监身份的限制，不可能完全参与和了解这三年中永历文武大臣的活动。而这段历史的某些空缺，基本上是由《也是录》填上的。翦伯赞先生指出：“正史记事，多有遗逸、逸事之类的书，即所以补正史之遗逸……若无邓凯《求野录》、罗谦《也是录》，便不知明桂王亡国君臣在缅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后的下落。”[27]是为的论。事实上，有清一代，包括官修的《明史》、《通鉴辑览》、《通鉴纲目三编》在内，举凡叙述这段历史的官书稗史，从康熙年间刘茝《狩缅纪事》、顾开雍《客滇杂钞》、胡钦华《天南纪事》、计六奇《粤滇记略》[28]、彭孙贻《流寇志》、戴笠《行在阳秋》、沈佳《存信编》、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、黄宗羲《永历纪年》、冯甦《见闻随笔》[29]、徐秉义《明末忠烈纪实》、温睿临《南疆逸史》[30]、杨陆荣《三藩纪事本末》、毛奇龄《蛮司合志》、叶梦珠《续编绥寇纪略》、金钟《皇明末造录》、郑达《野史无文》、邵廷采《西南纪事》、陈鼎《留溪外传》、屈大均《皇明四朝成仁录》、江日升《台湾外纪》，到乾隆年间倪蜕《滇云历年传》、汪有典《明忠义别传》、李天根《爝火录》、南沙三余氏《五藩实录》，到咸丰年间徐鼒《小腆纪年附考》和《小腆纪传》、陈克家《明纪》、刘景伯《蜀龟鉴》，到同治年间夏燮《明通鉴》，到光绪年间倪在田《续明史纪事本末》，另有不详著作时间的王源鲁《小腆纪叙》[31]、锁绿山人《明亡述略》等，无一不是直录或转引《也是录》。

邓凯称自己“生平公直自矢。内有与凯交同刎颈，过亦不敢隐；仇同弑父，善亦不敢匿。如有一字涉谬，天地不载，鬼神必诛”。他甚至对自己效忠的永历皇帝也提出了批评：“皇上过慈寡断，利小忘大，致诸奸蒙蔽，阻贤任邪，三尺之童知有今日矣。”[32]细读《也是录》，字里行间的确让人感到邓氏客观严谨的著录态度。如马吉翔的旗鼓官吴承爵“推凯失跌”，导致邓凯“不省人事，七日水米不入，三年寸步不离卧床”。但在记述这个仇人时，邓氏仍然秉笔直书曰：“翔有失，（吴承爵）尝变色叱之。”相较王夫之纂南明史每以好恶臧否人事，邓凯之书无疑当得起“质实无虚语”[33]的评价。

三

《也是录》一书的流传大致如下：

在成书于康熙初年的《狩缅纪事》[34]里，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抄录《也是录》的痕迹。另外，如前所述，通海周肇孔曾于康熙六年（1667 年）为《也是录》作序。康熙九年，桐城方孝标游历滇黔，后作《滇游纪闻》一书，内称：“余初至滇黔，亦问之，无多知者。及见冯君再来之《滇考》、胡君皀庵之《雪涕录》、《西南闻见录》、马君君辉之《征行纪略》、邓君某之《也是录》，合之所闻所传闻而后稍得其略。”[35]综上可见，至迟康熙十年左右，《也是录》已在云贵士夫之间传布

了。

叶梦珠《续编绥寇纪略·序》称："余友倪子宣远、林子广平，年来与余先后同下帷于笋里之清河氏，出示《滇蜀纪闻》及《楚中遗事》二三编，皆孙李流蔓诸事，梅村所不及纪者。云得诸同郡先达忍斋张司李。忍斋于顺治之季成进士，宦滇南，今上改元而归里。帙中所载大概本诸邓凯《也是录》。凯于永明王称帝时为东宫扈从，事皆身历，幸而不与渡河之难。迨永历君殁而凯尚为僧。忍斋宦滇时宜及见之。"张司李即张一鹄。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十一《官师》在云南府推官一节载："张一鹄，江宁松江府华亭人，进士，顺治十八年任。鲁期昌，山东济南府章丘县人，进士，康熙元年任。"可见，张氏的确是康熙元年内卸任离滇的，并且把《也是录》一同带往松江。另外，笔者分析，作为张一鹄的同乡，顾开雍极有可能就是这段时间跟从张氏来滇游历，并且参酌《也是录》等书编撰了《滇蜀纪闻》，也就是《客滇杂钞》一书。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海宁查继佐曾抄录《也是录》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，海盐陈敬简曾抄录包含《也是录》的《三异词录》十一种[36]。因此，早在康熙初，江浙一带就在流传《也是录》。

嗣后，《也是录》一路由罗谦于康熙一、二十年间传入中原地区[37]，一路由邓凯、郑达[38]等于康熙三十年左右再次传入湖广和江南地区，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一部史籍。南京图书馆藏抄本《三异词录》收有罗谦作序的《也是录》和《残明纪事》，二书曾经王士禛改易后"呈圣天子御览"[39]。那么，删本《也是录》应到过北京，抵京时间当在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清廷重开明史馆，要求民间献书以后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，"《南山集》案"发。因戴名世《南山集》引录了同乡方孝标《滇游纪闻》的文字，而《滇游纪闻》提到"邓君某之《也是录》"，《也是录》因而受到这场文字狱的牵连。《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刑部尚书哈山为审明戴名世〈南山集〉案并将涉案犯人拟罪事题本》称："查《滇黔纪闻》内有冯载来所作《滇考》、胡福安所作《学题录》、《西南闻见录》、马俊辉所作《正兴百聊》、邓穆所作《叶石录》等篇目。咨行直隶等各省将该五篇文严查送部，并交翰林院审阅奏闻。"[40]

噩运还没有结束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浙江巡抚三宝以"所纪事迹间有微词触碍"为由奏缴邓凯录、罗谦序《也是录》，乾隆皇帝批准后入《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》，各省开始大规模的清查销毁。

经过这场浩劫，《也是录》几乎销声匿迹了。直到文禁稍弛的嘉庆、道光时期，它才以刊入明季野史丛书的形式重见天日。当然，在民间，《也是录》一直被抄写播布，从未断绝。

经过调查，海峡两岸现存的《也是录》有近四十种。除国家图书馆所藏《明季野史》和《明季野史汇编》、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《明逸史十家集》、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《明季野史汇编》、大连市图书馆所藏《明季杂史》等无缘得见外，笔者目寓手检了其他的本子，当另撰文详述之。这里，仅就调查结果总结《也是录》诸版本的三种形式：

（一）足本

目前所知，《也是录》足本仅一种，即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《明季野史杂钞》。

《明季野史杂钞》不分卷，不题何氏所编。其书先为上海白蕉（何法治）所藏，后赠吴江柳亚子[41]。据书中讳"玄"、"烨"、"胤"、"弘"、"历"不讳"宁"的情况来看，当抄于乾、嘉间。又据书中间有"鞑子"等违禁词语，编撰或在康熙年间。此版《也是录》有邓凯自叙，无周肇孔、罗谦序，应该成书于康熙六年以前。此版《也是录》之前是顾开雍的《客滇杂钞》，《杂钞》内《入缅始末》有"自铜壁关入缅事悉载邓凯《也是录》"的注解；书中又间有"邓君在内，尚未知定国与文选边外议，甚不然也"一类的话，符合转述的语气。笔者进一步推断，它应该就是顾氏在康熙一、二年间汇入《客滇杂钞》的一篇。另外，全祖望《题也是录》中所谓"责李定国似太苛"，正是由此版《也是录》邓凯自叙中"罪之最者，李定国、白文选也"一句而发。傅以礼《也是录跋》说："今此本

于定国甚略，与全氏之言不合”，可见时至清末，即便是南明史家也没有见到过这个足本。事实上，早在乾隆年间，遭禁毁的邓凯录、罗谦序《也是录》也是删本。基本可以肯定，此版《也是录》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：内容繁细，不加删节；文字质朴，未经润色，相当接近于《也是录》的最初面貌，价值不言而喻。清初赵元祚有《林启俊传》，内称：“粤藩入缅，沐黔国诸人同死木城。据《也是录》，吾邑林柱伯在焉。”[42]但不仅各删本的咒水死难者名单中没有林启俊的名字，这个足本也没有。据此，笔者认为，“据《也是录》”这句话很可能是上句“沐黔国诸人同死木城”的小字注解，因排版错误而衍入正文；而“吾邑林柱伯在焉”只是赵元祚的推测。

（二）删本

笔者所见到的其他版本《也是录》都属于足本的节录，包括：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《明季十二家集》、抄本《明季野史三十四种》、抄本《三异词录》、抄本《明末十家集》、抄本《明季稗乘》、中华图书馆民国元年石印本《明末野史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《明末野史》、抄本《八家集》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《铜仙逸史》，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《也是录》（两种），南京图书馆藏抄本《三异词录》，山西祁县图书馆藏抄本《明末十家集》，安徽省博物馆藏康熙十九年枕经楼抄本《三异词录》，浙江图书馆藏周大辅鸽峰草堂抄本《三异词录》，湖北省图书馆藏抄本《明季十家集》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《明季十家集》，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《明末十家集》，以及习见的《滇系》、《明季稗史汇编》二本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整理本等。

删本多附罗谦序。从《也是录》、《残明纪事》、《安龙逸史》诸书中他作的序、启来看，罗谦系云南昆明人，字元益，号桐山樵隐、冥鸿子，明代遗民。曾避三藩之乱寓居河南阳武[43]。在阳武，罗氏根据所见《安龙逸史》等材料删改《明末滇南纪略》为《滇南外史》。

认真比勘各本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删本也有成书先后的区别：

《三异词录》本奉守永历年号，于己方尊称“帝”、“上”、“永皇”，于敌方则直斥“清师”、“满兵”、“大逆”；篇末除“咒水之会被难者”、“从陆行诸臣被杀者”、“未遭乱而以病卒者”还附有“壬寅年随帝还滇被难者”名单，俱从足本来，成书最早。《明季稗乘》本题为《也是录删》，且云“自非和尚纪、桐山樵隐述”；又据序文所言，“是录得之乡闾好古者之家，亟请而缮录一帖”，则抄录而删节《也是录》者正是罗谦。笔者统计，足本《也是录》约 8700 多字，诸删本平均 4700 多字。显然，罗氏只为化繁为简，却因此遗漏了不少有价值的内容，如在缅各官奉承马吉翔的史事，得不偿失。

上图本罗谦序文与《三异词录》本相较更为雅驯，应该经过修饰；正文虽然保留了南明正朔，篇末的还滇名单却已付阙如，代以“其诸臣子女之死者，不及悉记也。吁，酷矣！”的评议，都是后出的标志。《明季稗乘》本内容全同，但题名犹存“《也是录删》”的原貌，当稍晚于《三异词录》本。不过，作为《也是录》较早的删本，这三个本子具有以后诸本不可比拟的校勘价值。如在罗序中有一句“永、洪之蕴酿其仁”，两种《明季稗史汇编》本均误作“永、洪之蕴酿其人”，无疑是传抄过程中音近而讹了。

其他本子罗谦序俱袭上图本，后遂定式；正文文字除新增的讹脱衍倒外，或者以清朝立场改易原书书法（如改永历为顺治、康熙纪年，改“帝”为“永明王”等），或者添加清朝的讳字，当抄于清中叶书禁转严之时。《滇系》、《明季稗史汇编》有刊刻年月，毋庸赘言。

（三）修润本

廖燕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卷十七有《永历幸缅始末》一篇[44]，属于《也是录》特殊的文言形式。廖燕于篇末题曰：“此出邓凯手录。凯，吉安人。从永历最久，授随驾总兵，官右军都督同知。尝廷叱马吉翔。虽罹家国播迁，而君臣之分凛然，明亡，遂剃发为僧。但凯武人，不知文理，予以意测之，为润色如此。”经核对，廖氏此篇是据足本《也是录》拔粹而成，词虽典切，事多精简，却不能代替邓凯原作。

四

1945年，方国瑜先生曾作《〈也是录〉笺证》，遗稿经方福祺整理，发表在2004年《西南古籍研究》上。方先生判定通行的《也是录》并非足本，为恢复其原貌，该文对《也是录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研究。具体而言，以《滇系·典故》所收删本《也是录》为纲，该版本因清朝立场改易的书法全部改回，补充了大量见于《南疆逸史》、《庭闻录》、《行在阳秋》、《西南纪事》、《求野录》、《南明野史》等书中可能是《也是录》足本的内容，间加评述。另外，方先生还参酌诸书，略述永历入滇前经历，附于篇首。无疑，《〈也是录〉笺证》一文完成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完成的所有任务，为《也是录》和永历入缅历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但是，诚如先生自己所说，一方面，“所知此二书（《也是录》和《求野录》）传抄流传之本亦甚多，而瑜亲览者则甚少”，笺证时没有见到足本《也是录》；另一方面，“盼能读未见书增益之，不如愿也”[45]，笺证时参考文献较少，且多二、三手材料。今天，不仅既是祖本、又是足本的《明季野史杂钞·也是录》被发现，一些重要的原始史料也涌现出来。对这样一部叙说南明永历政权历史的一次文献，实有必要重新校正其文字，诠释其词语，补充其资料，评述其内容，以期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、可靠的版本。

---

①本文称引的《也是录》，收录于国家图书馆藏《明季野史杂钞》中，是《也是录》的足本。足本与通行的删本（如《明季稗史汇编》本）之间的关系，详见后文。

②如：全祖望《鲒埼亭集外编》（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，卷二十九《题也是录》），傅以礼《华延年室题跋》（宣统元年铅印本，卷上“求野录”、“也是录”条），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（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845页），朱希祖《明季史料题跋》（中华书局，1961年，第59—62页），陈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（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31、232页），谢国桢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540—542页），方国瑜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（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358—361页），方国瑜著、方福祺整理《〈也是录〉笺证》（《西南古籍研究》，云南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07—129页）等。

③郑达：《野史无文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60页。

④刘葳等：《狩缅纪事（外三种）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68页。

⑤原题刘湘客撰。据剑心《行在阳秋》跋（中国历史研究社编：《三朝野记》，上海书店，1982年，第307、308页），定为戴笠编撰。

⑥原题阙名朝鲜人撰。据孙卫国《朝鲜〈皇明遗民传〉的作者及其成书》（《汉学研究》第20卷第1期，2002年6月，第163—188页），定为成海应编撰。

⑦方树梅：《担当年谱》，云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。

⑧康熙《云南府志》卷十七《寺观》：“普照寺，在州西六里长松山内”、“扬光寺，在城内大智坊”。

⑨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七，康熙四年十二月己未，《清实录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254页。

⑩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312页。按：徐秉义《培林堂书目》载：“周肇孔《也是录》一卷，抄”，当即此本。此本未见，或已亡佚。但源于此本的郑达《野史无文》、金钟《皇明末造录》中都有类似如下的话：“入缅以后，阻绝遐荒，语言文字不通，非身入险难、扈从在缅、躬亲牧御之人，则其言不足信。使经险而非留余身于锋镝之中者，则其言亦不足信。其言信而可听矣，又使其人有所偏徇，一字之是非，或失千秋之曲直，则其言更不足信而听之矣。具此三难，而不得不辨析以传于后世，不更难之难者乎！”此应该就是二书摘抄周序的内容。

⑪陈鼎：《留溪外传》卷十八《也是和尚传》，《常州先哲遗书》本。

⑫沈佳：《存信编》卷五，国家图书馆藏清末抄本。

⑬孔定芳：《清初明遗民的“云游”行为及其意蕴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05年第3期，第112—119页。

⑭邓凯：《也是录·叙》。

⑮全祖望：《鲒埼亭诗集》卷三《明洪熙古刺水歌为马嶰谷作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。

⑯张其淦、祁正：《明代千遗民诗咏三编》卷三“邓凯”，《寓园丛书》本。

⑰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《长恩阁丛书》中有无名氏《滇缅录》一卷，或即此书，惜闭馆无缘得见。

⑱《天南纪事·永历帝入缅本末下》（四川省图书馆藏《明季野史三种》本）：“缅于万历中绝贡，据有木邦、麓川、南甸、八百媳妇之地，雄视百蛮，但与古刺、暹罗为世仇。帝自蛮漠舟行，从官云散，多被戕害。有走入古刺者，马九功、江国泰是也；有走入

暹罗者，总兵温如珍是也。如珍，启祯朝大镇，为时知名，暹罗王绝爱之，以女妻之。如珍又先以女为晋王妃。于是，间道通殷勤，约连兵以攻缅。九功等为古剌招致溃兵二千余人，亦致书定国。”

⑲方国瑜：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，第 360 页。

⑳夏定域：《〈明季史料题跋〉补正——有关明季农民军史料的补充》，《浙江学刊》1963 年第 4 期，第 44、45 页。

㉑《求野录》（国家图书馆藏《三异词录十二种》本）：“缅于万历中绝贡，且据有木邦、麓川及八百媳妇之地，雄恃西南，然与古剌、暹罗两国为世仇。初帝自蛮漠舟行，从官云散，有入古剌者，马九功、江国泰等；总兵温如珍等则入暹罗。如珍，启祯朝大镇，为时名将，暹罗主绝爱之，妻以女。如珍又先以女为晋王次妃。于是，间道通殷勤，谋连兵攻缅。九功等于古剌招集溃兵得三千余人，亦致书晋王。”

㉒朱希祖：《明季史料题跋》，第 61、62 页。

㉓“乙巳（康熙四年，1665）先生六十五岁……纪僧自非《滇南始末》。自非，号普静，原名邓凯，系籍吉安。其纪事原序则玄默摄提格天中节之后六日云。”（沈起：《查继佐年谱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 年，第 58、59 页）

㉔参见拙文《〈明史〉札记一则》，《云南图书馆》2012 年第 1 期，第 79、80 页。

㉕杨凤苞：《秋室先生集》卷二《南疆逸史跋一》，光绪十一年陆心源刻本。

㉖苏瀜：《惕斋见闻录》，《明季史料丛书》，民国二十三年圣泽园影印本，第八册。

㉗翦伯赞：《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》，《史料与史学》，北京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47 页。按：翦先生所谓“邓凯《求野录》、罗谦《也是录》”，是承袭了通行的说法，实不确。

㉘原题九峰居士编辑。据张崟《计六奇与〈明季南北略〉》（《清史论丛》第二辑，1980 年，第 320—329 页），定为计六奇编撰。

㉙另有珠江寓舫《劫灰录》，袭自《见闻随笔》，不列。

㉚另有凌雪《南天痕》，袭自《南疆逸史》，不列。

㉛另有娄东梅村野史《鹿樵纪闻》，袭自《小腆纪叙》，不列。

㉜邓凯：《也是录·叙》。

㉝全祖望：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十九《题也是录》。

㉞《狩缅纪事》所载之事，最晚为“癸卯二月”，当葳于康熙二年（1663）以后；《狩缅纪事》语气慷慨激烈，批评全无顾忌，成书又不宜过晚，故系之康熙初年。按：据《恒秀林语录》等书，刘蒞明亡后历游滇云间，曾寓居河阳；又据《平滇始末》“方乱起，余与同志刘文季、林牧士逆料必败，所以我三人始终洁身也”一句，则三藩乱后刘蒞尚在人世。可参高国强《〈狩缅纪事〉校注》（云南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）。

㉟方孝标：《滇游纪闻》，《钝斋文选》卷三，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。

㊱安徽省博物馆藏《三异词录》十一种，题为沈香山编，康熙十九年枕经楼抄本。

㊲罗谦于康熙庚申（康熙十九年，1680）春为《残明纪事》作序：“初得《也是录》，既序而识之矣。兹以避兵阳武，复睹《残明纪事》一书。”（《残明纪事》，《适园丛书》本）

㊳按：郑达将《也是录》稍加增易，改题为《永历皇帝兵败入缅甸土司纪事》，辑入《野史无文》卷六。又据《野史无文》卷十三《张煌言纪略》，郑达曾于康熙二十七年至杭州，康熙五十二年至常熟。

㊴王士禛在《也是录·罗谦序》书眉批云：“大清驱流贼李自成，为明报仇，而后受天命。古来得天下，未有光明正大若斯者也。永明王入朝，当不失虞宾之位，乃不见几，卒为吴逆所害，可悲也夫！”

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戴名世〈南山集〉案史料》，《历史档案》2001 年第 2 期，第 23 页。按：此文是满文题本的音译。

㊶谢国桢：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，第 1014 页。

㊷赵元祚：《林启俊传》，《滇系》卷八《艺文十六》，光绪十三年重刊本。

㊸嘉业堂本《安龙逸史·罗谦序》作“避兵武阳”，倒误。云南图书馆藏抄本《安龙逸史·溪上樵隐序》内有“吾中土去安龙万里”一语，因此避兵之所不可能是湖南、江西武阳，只能是河南阳武。按：嘉业堂本《安龙逸史》与适园丛书本《残明纪事》实为一书，而它们的祖本就是云南图书馆藏抄本《安龙逸史》，惟文字稍有改易。

㊹廖燕：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卷十七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三年刻本。

㊺方国瑜：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，第 361 页。